

书间消息

砚田拓荒为本相

——田本相和他的两种新著

祝晓风

田本相先生最近的这两本书，都有“砚田”之名，可见作者对此偏爱。田先生说他就像个老农夫一样，每天在砚田中耕作。所以，以“砚田先生”指代田先生，也无不可。很长一段时间，我自认为对田先生是比较了解的。——我们相识已有二十多年，因为工作关系，与田先生前前后后也打过一些交道。

不过，这了解毕竟还是浅。这个认识，是我在重新读了田先生的几本书，特别是《砚田笔耕记》之后的深刻感受。毫不夸张地说，田本相先生这个人，本身就是一部大书。

对田先生本人来说，他一生可以说有三次大的转折：一是参军，上前线。1949年3月23日，田本相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二分队——这个四野南下工作团中，当年还有汪曾祺。那一年，田本相十七岁，还是一个富有激情和梦想的青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田本相被派往前线，到19兵团任机要组长。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场大战，收获的不仅仅是三等功和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还有成熟与正直，和一个勇字。

二是上南开。南开八年，几乎就规定了他今后的职业方向，塑造了他的学术品格，也使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田本相此后的人生轨迹。本科五年之后，又接着跟李何林读研究生三年。多读的这三年，就决定了田本相与他大多数同学在学术上的差别，那就是系统的正规的学术训练，在研究和写作能力上，有了质的飞跃。

三是到北京，先在北京广播学院二十年，后到中央戏剧学院，最后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1987年10月7日，田本相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报到，接任葛一虹，任话剧研究所所长。这一天，不仅对他个人是重要的，对于中国话剧史研究，对于中国话剧研究，也是值得记入历史的日子。几个不同学术科研机构的工作经历，使他获得了更广更深的知识准备。在广院，他一边教学，一边研究新兴的电视化学。在中戏，他更是直接地接触、研究戏剧表演、舞蹈、美术等舞台艺术中的各个方面，并且写作、完成了《曹禺戏剧论》。

回过头来看，他经历的这些炮火洗礼，学术训练，好像都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他自称，在北广和中戏做了二十余年的“边缘人”，但正是这些“边缘”时光，给了一个学者充分的沉潜的时间。他终于走到学术与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一个学科，一门学问，最重要的，是基础性研究。田本相对中国话剧研究的贡献，对整个中国话剧的贡献，不在于他当了个话剧所所长，而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基础性研究的重要。只不过，他在所长的位置上，把话剧史，这个基础性研究确定为研究所重点，全面地彻底地推进开来。这就是田本相在学术组织方面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感。当然，这也体现了他的勇。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田本相就意识到，中国话剧史是一个未开垦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生荒地。当年，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都还在酝酿写作之中，尚未问世。1984年，田本相到中央戏剧学院教书时，发现堂堂中戏，竟然没有中国话剧史的课程；而一些戏剧评论家、戏剧理论家，对中国话剧史也缺乏足够知识，以至于一些所谓“大腕”声言，中国话剧的历史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5年，田本相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构想。进入90年代，陈白尘、董健的《史稿》，葛一虹的《通史》，还有田本相的《比较戏剧史》相继问世。这三部史，可代表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史研究的水准，也标志着中国话剧史学科的建立与阶段成果。可以说，田本相与他长一辈的陈、葛诸先生一样，都是中国话剧史学科的奠基者与开拓者。而其中，田本相因为有着曹禺专门研究的根基，他的成果就更富有个人色彩。

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的一个集大成者。研究中国话剧史，必研究曹禺。而在曹禺研究这一点上，田本相下了别人没有下过的功夫。他的《曹禺剧

作论》《曹禺访谈录》《曹禺传》，形成一个系统的纵深的成果。《曹禺访谈录》《曹禺传》是田本相在曹禺的直接支持下，采访大量当事人，发掘、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研究，才是坚实的，才是真正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才能写出曹禺“苦闷的灵魂”，超越传主的个人视角，对传主做历史的和学术的审视。这些访谈，这些一手史料，也在《曹禺访谈录》中发表出来，引发出整个现代文学界对曹禺研究的一个新的向度。田先生关于曹禺的这些成果，这些第一手史料，问世，就为学界所重，是研究现代文学、现代史必读的书。

一般人，能发掘出这些史料，能写出一部像样的《曹禺传》，就足以使自己的名字铭刻在学术史上了。但田本相的成果远不止于此。概括地说，田先生本人的成果，一是丰富，涉及话剧史、话剧理论的各方面，研究了许多关键人物，提出了许多引领学术的问题。二是贯通与宏大，不但是上下贯通，把话剧各个方面贯通，把戏剧批评和戏剧史、戏剧理论三者贯通，把戏剧和文学贯通。在这种大贯通之上，田本相建立了自己的话剧史理论体系。三是基础性，他本人的研究，还有他所主持的诸多研究，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

田先生在离休之后，在主编《中国话剧艺术通史》和撰写《中国话剧百年史述》之后，仍不止步。经过多年准备，努力，他主编的九卷本《中国话剧艺术史》2016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力求还话剧史以综合艺术史本体，对百年来中国话剧史作了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梳理，是一部

具有百年总结性质的里程碑意义的史著。

这本《砚田无晚岁——田本相戏剧论集》，则是砚田先生最新的论文集，集中了作者最重要的一些理论思考。比如，田先生曾经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历史有一个评估，认为它有两个特点，两个潮流，一大弱点。两个特点，一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移植性、模仿性和实用性；二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经验性。两个潮流，一是诗化现实主义的理论潮流；二是实用现实主义潮流。一大弱点，是学院派理论的孱弱（宋宝珍著：《残缺的翅膀——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稿》序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页）。其中，“学院派戏剧批评”就是田先生近年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何谓“学院派戏剧批评”，田先生认为，它首先意味着是一种精神，即独立的、自由的、讲学理的、具有文化超越的远见和胆识的批评精神。大力提倡“学院派批评”，也是田先生近年对于戏剧批评的一个贡献。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田本相出任话剧所所长，首先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话剧的传统问题。他当时就想，中国话剧难道就是“战斗的传统观念”所能完全概括的吗？难道真像所谓“大师”和“先锋”所说的，中国话剧没有留下什么好的东西吗？——此文集中，就有几篇文章论述中国话剧的“诗化传统”和“诗化现实主义”。这两个概念和提法，不妨看作一个大概念。他指出，中国的文学传统是赋、词、曲皆由诗演化而来。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来

的话剧，进入中国这个伟大的诗的国度，也为这个强大的传统所融合，就不可避免为这强大的“诗胃”所消化。“话剧走进这个伟大的诗的国度，即开始了话剧的诗化进程。”“中国的诗化现实主义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田汉，30年代形成曹禺、夏衍的诗化现实主义主流。它是在吸收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学的诗性智慧和更中国戏曲的诗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在奋起抗战的民族大觉醒之际，最终构筑成中国话剧的宝贵的艺术传统。”“这样一个传统是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最值得继承和发展的。中国话剧的希望也在这里。”

这是田先生对于中国话剧传统的一个总的命题。在这个总命题之下，他还有许多精深的研究，如，他提出“诗意真实”概念，所谓“诗意真实”，“首先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诗意的捕捉、感悟、提炼和升华”。他发现，焦菊隐也一再强调舞台的“诗的意境”。心象、意象，这本是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戏剧艺术所要创造的即是戏剧意象。焦菊隐反复强调的是，没有演员的富有创意的审美感受、审美体验，就不能产生“心象”。于是说：“演员真该像是一个苦吟诗人、敏锐地去感应，把生活的里里外外不遗漏、一丝一毫地都记载下来，记在情感中，记在笔记本里。”（《于是之论表演艺术》第13页）田先生指出，这里说的“感应”，“记在感情中”，就是焦菊隐强调演员审美感应的注脚。

文集中，除了作者这些关于学院派戏剧批评的最新观点，对于中国话剧史，特别是诗化传统的新的进一步的论述，还有作者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评述和回忆，这里面既有学者，如李何林、宁宗一、焦尚志，也有导演和演员，如石挥、于是之、苏民等，当然也不少了曹禺。总之，内容丰富，随处可见新的材料和睿见，可以说是吐金咳玉，每一篇都浸透作者几十年的心血，包含作者的学术思想精华。

《砚田无晚岁——田本相戏剧论集》，田本相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出；《砚田笔耕记——田本相回忆录》，田本相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6月）



图为沈尹默先生给朋友的绘画作品、给学生的书法写的批语（“下笔轻、着纸重”，“画平竖直”）及使用过的文房四宝。“一代宗师——沈尹默诞生135周年纪念文献展”将在海派文化中心展至2019年3月10日。

英文里的「禅」

曾泰元

长久以来，英语世界若是提到“禅宗”，其所用的关键字眼，几乎都是源自日文的 Zen（禅，完整作 Zen Buddhism “佛教禅宗”）。大多数西方人也认为，禅宗是日本精神文化的产物，鲜少例外。

日本的禅宗于“鎌仓时代”由南宋传去，自此之后在东瀛发扬光大，对日本的生活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以说是几分欣喜几分无奈。欣喜的是，汉传佛教强大，丰富了日本文化的精神面貌。无奈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世界只知学生而不识老师。

上个世纪初，有“世界禅者”之誉的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开始向西方传播禅宗思想，所传播的是一种生活哲学，适合大众的口味。他数十年的辛勤耕耘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开花结果，西方世界对日本禅宗的兴趣大增，Zen 也成了个时髦的名词。对于一般的西方人而言，Zen 意味着接受现状，意味着内心平和。

词典反映现状。在英语世界里，禅宗广为人知，禅思维、禅生活随处可见。中型以上的英文词典，基本都收录了 Zen，同时还会提及源自日本。这代表的是，东方的 Zen，已经横越了大半地球，来到西方，飞入了英美的寻常百姓家。甚至，原属宗教范畴的 Zen，在英文里也由名词转变成形容词，用以描述一种以禅为本的人生态度。

兹举中型权威的 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剑桥高阶学习词典）为例，Zen 的本义，在此得到了浅显清晰的阐述：

a form of Buddhism, originally developed in Japan, that emphasizes that religious knowledge is achieved through emptying the mind of thoughts and giving attention to only one thing, rather than by reading religious writings. (佛教的派别之一，最初发展于日本，强调的是对宗教的认识必须通过排除心中杂念，并专注一境，方可达成，而不是藉由研读宗教典籍。) 同样在剑桥词典里，这个源自日本的 Zen 还有个形容词的义项，指的是把禅宗哲理内化后，展现出来的一种人世的特质：

relaxed and not worrying about things that you cannot change (心情放松、对无法改变的事物不去忧虑)。剑桥词典附上了一条例句，展现了“禅”生活化的一面。作为非专名的一般形容词，首字母因而也可以小写：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so you just have to be a bit more zen about it. (你做什么都能改变不了这个状况，所以对此你就得多想开一点。)

Zen 丰富了英文，丰富了英语世界。然而日本禅宗贡献给英文的词汇，却远远不止于此。除了 Zen 之外，禅宗的许多专业术语，也都系统地通过日文进入了英文，并为大型的英语词典所收，比如 roshi (老师，即“禅师”)、koan (公案)、mondo (问答)、satori (悟)、mu (无)、mushin (无心)、wabi (侘，音 chà，孤寥矢志貌)、sabi (寂)、zazen (坐禅)、Rinzai (临济宗，日本禅宗的三大派别之一)、Soto (曹洞宗，日本禅宗的三大派别之一)、Obaku (黄檗宗，日本禅宗的三大派别之一)。英文里起码有上述这 13 个源自日文的禅宗词汇，日本禅宗的影响力如此庞大，令人惊讶赞叹！

中国禅宗，相传由天竺高僧菩提达摩 (Bodhidharma) 东渡来华，于公元 5 世纪的南北朝所创立，经几代传人发扬，开枝散叶，流行日广，唐宋时极盛，公元 12 世纪末南宋时东传日本，于清初逐渐没落。作为师承的中国禅宗，在英文世界的情况究竟如何？

2018 年 10 月初，《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简称 OED) 发布了年度第 3 季的新词新义，共有 1400 余项。中国禅宗以汉语拼音的 Chan 现身词表，让我眼睛一亮，心中感叹，有此等分量的词典加持，这可是“迟来的正义”啊！OED 对 Chan 的定义如下：

A Chinese school of Mahayana Buddhism which emphasizes the value of meditation as a means of finding spiritual insight and enlightenment, and which gave ri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Zen in Japan. (中国大乘佛教的一个宗派，强调禅定乃觉悟之法，催生了日本禅宗的发展。)

OED 所谓的新词新义 (英文原文作 new words, senses, and subentries “新词、新义和新副条目”)，其实绝大多数并不新，只是因为过去漏收，现在补遗，或者经过一定时间 (起码 10 年) 的观察之后，发现证据充分，才决定纳入。

事实上，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 1961 年，美国最大的《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简称 W3) 就已经以威妥玛拼音的 Ch'an 收录了中国禅宗：

a Chinese school of Mahayana Buddhism founded in the 6th century A.D. by the Indian teacher Bodhidharma that emphasizes meditation and higher contemplation as a method of salvation -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he Japanese Zen or the Indian Dhyana. (中国大乘佛教的一个宗派，由印度禅师菩提达摩于公元 6 世纪创立，强调以禅定与高层次的冥想作为修行的方法——中国的 Ch'an 相当于日本的 Zen 或印度的 Dhyana。)

虽然 W3 比 OED 早五十多年收录，不过当时的时空环境不同，W3 的一个 Ch'an 字空有翔实的定义，却缺乏其他软硬条件的配合与支撑，就这样养在深闺人未识，沉寂至今，除了专业人士之外，罕为外界所知。OED 和 W3 都收录了 Chan，然而英文的“禅宗”一直还是日文 Zen 的天下。OED 的书记表明，Zen 于 1727 年首见于世，而 Chan 得迟至 1901 年才有文献记录，前后差了近 200 年！而且，中国禅宗的 Chan 在英文里形单影只，不似日本禅宗的 Zen 还有 12 个相关词语围绕作伴，众星拱月。

礼失求诸野，现在的世界通过日本来了解禅宗，这教作为老师的中国怎能不感慨万千？再往前推，中国的禅宗来自印度，名称也来自印度：Chan (禅) 为 channa (禅那) 的简称，而 channa 则译自巴利语 (Pali) 或普拉克里特语 (Prakrit) 的 jhana，最终源于梵语的 dhyana。由始祖印度观之，这个禅更是彻底的“礼失求诸野”了。

在 OED 这一季的更新里，中文只给英文贡献了一个 Chan (禅宗)，而日文的词语却有 4 个：butoh (舞蹈，日本一种狂野的现代舞)、butsudan (佛坛，日本供奉神佛和祖先牌位的柜子)、kaiju (怪兽，日本特摄电影的一种类型)、kaiju eiga (怪兽映画，即怪兽电影)。这四个词，有传统，有现代，色彩纷呈，活力十足，其中的“佛坛”和“怪兽”，或为唐朝以前就有的词汇，疑是日文直接借自中文的。

日本文化的魅力，让欧美着迷，相关的日文词汇，英文自然也就吸收了。这一切我们看在眼里，可真是五味杂陈啊！罢了，那就怀着禅心，设法看开一点了！

残存的苏州河古道

段炼

位于普陀区长征镇西南端的建德花园紧挨着苏州河，与长宁区新泾镇隔河相望。随着苏州河的整治，鱼跃江边，鸟栖林间，建德花园附近苏州河段现已建成一片美丽的滨河绿地。在这里健身和游玩的人们，谁又能想到就在滨河绿地的北端尽头，还有一条残存的吴淞江古道。这条河道位于香樟路以西、泾阳路以北，呈半环状，长约 0.5 公里，宽 20-30 米，深 2 米

左右。由于隐藏在厂房和违章搭建区域的深处，只能从周边的菜市场、幼儿园透过围栏围墙一窥端倪。

如果说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那么吴淞江则是辈分更高的祖母河。吴淞江又称松江，源自江苏省吴江县城以南的太湖口，下游入海口称沪淞，上海简称“沪”就是从这里来的。古代的吴淞江是连接太湖和东海的重要河流，水量充沛，江面最开阔处宽达 20 里。江海汇流，泥沙堆积，促使海岸线不断向东推移，吴淞江几乎催生了大半个古代上海。元至元十五年

(1278 年) 改华亭府为松江府，至元二十八年 (1292 年) 上海设县。

古书《禹贡》有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意思是只要吴淞江与娄江、东江三条河道保持畅通，太湖流域就不会发生水涝灾害。然而，北宋时期在上游修筑长堤，阻碍了太湖泄水流，导致吴淞江出现淤浅，河宽逐年递减。元末明初，吴淞江下游江面只有四五十米。明永乐元年 (1403 年)，户部尚书夏元吉采用上海诸生叶宗行的建议，废弃了日渐淤塞的吴淞江下游旧河道，开浚范家浜，引江

水东流折北，由吴淞口注入长江。并进一步开挖黄浦，承接上游太湖大部分洪水，逐渐形成“以浦代淞”的局面。这样一来，吴淞江反而成了黄浦江的支流，为数百年后上海成为东方大港创造了条件。上海开埠以后，英国商人发现沿吴淞江溯流而上，乘船可以一直抵达苏州，索性就叫它 Soochow Creek，即“苏州河”。此后相沿成俗，上海市区下游河段习称苏州河，而北新泾以西上游河段仍称吴淞江。

浦淞合流之后，已废弃的旧吴淞

江河道简称“旧江”，因其曲折如虬，又被称作“虬江”。20 世纪初，虬江东段被陆续填筑，筑成虬江路，今仅存 5 公里河段汇入黄浦江，称虬江港。而真如桃树浦以西的虬江河段，在 1981 年正式定名为西虬江，经木浜港与苏州河相连，是普陀区西南部一条重要河道。从“虬江”之名即可得知，古代的吴淞江河道弯曲，向有“五江四十二湾”之说。长征镇境内的这条环形小河，原本就是吴淞江的一处弯道。20 世纪初，吴淞江仍是上海连通太湖流域的水上交通命脉。然而，北

新泾这一段急转的弯道成了船只往来的老虎口。在 30 年代一次治河工程中，从弯道上游的河口起，开凿新河道连接下游河段，使之成为直线河道，大大改善了吴淞江的通航能力。

裁弯取直留存的老河道，自西向东弯曲成钩状。弯道下游河段被切断填没 90 米，而西段有西浜汇入，可以连接北部众多河浜。于是，这一段残存的河道就成了西通吴淞江的一条支河，当地民众称之为“吴淞江古道”。在沿河疏浚工程中，又将挖掘出的泥土堆积于北岸，形成略高于堤岸的斜坡土墩。1954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兴建北新泾苗圃，吴淞江古道成为苗圃排灌专用河道。20 世纪 80 年代，弯道地块由部队使用，这里成了外人难以进入的神秘之地。由于天然的地理环境优势，加上军事化的封闭管理，毗邻老吴淞江弯道区域形成了独特的泾阳路生态区。2016 年，上海市全面推行河长制，这段残存的老吴淞江弯道正式定名为苏州河古道。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